

# 姚莹与《康轶纪行》

陈进忠

## (一)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又号展和,安徽桐城人,近代著名的爱国者和第一批主张“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之一。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姚莹任台湾兵备道,同总兵达洪阿一起,组织爱国军民多次挫败进犯台湾的英国侵略军,并先后在基隆和大安俘虏英国军事人员180名,使台湾在抗英斗争中“一方屹然,洋船不敢再犯”<sup>①</sup>,因而遭到投降派的忌恨,被诬以“贪杀冒功”。清廷即据此将姚、达逮捕入京,制造了打击抗战派的“台湾之狱”。后迫于民情士论,不得不将姚、达开释出狱。姚莹被以同知直隶知州衔贬逐到四川,1844年7月到成都。

其时,正值西藏察雅地区有两呼图克图<sup>②</sup>相争之事。而“蜀中旧例,有大不韪者,则罚以藏差”<sup>③</sup>。四川总督宝兴即命姚莹前往解决两呼图克图的纠纷。是年年底,他行抵理塘,因大呼图克图(当时在理塘)拒返察雅听讯结案而被迫返蓉。次年三月,姚莹再次奉宝兴之命,随同宁远知府宣谟、试用通判丁淦前往察雅和察木多(今昌都)办理此案。三人在察木多滞留半年,于1846年3月回到成都。

姚莹以花甲之年,两次出差康藏,往返万余里,历时一年又三个月,途中经荒山

野岭、雪原冰谷,艰苦备尝,其困顿颠连之状不可胜言。然而,他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壮怀犹昔,而不自觉身之衰老。他就藏人访西事,既得闻所未闻,并据此整理、增补成以介绍边疆地理和敌情外事为主要内容的《康轶纪行》。1846年底,姚莹写成初稿。1848年,他重加缮写,厘为十六卷,列图于卷末,并着手刊刻印行。

## (二)

《康轶纪行》在体裁上采用了“逐日杂记”的形式,不分门类。其主要内容,姚莹在《康轶纪行自叙》中说:“大约所记六端:一、乍雅使事始末;二、喇嘛及诸异教源流;三、外夷山川形势风土;四、入藏道里远近;五、泛论古今学术事实;六、沿途感触杂撰诗文。”后来,他在给友人陈子农的信中又说:“前使西藏,有《康轶纪行》十六卷,颇详西域山川疆域与英夷马头之在印度与后藏交界者。因乍雅前后藏而推及廓尔喀、披楞、五印度以至佛兰西、英吉利、弥利坚西洋有名诸国;因两呼图克图而推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黄教、红教以及诸国回教、欧罗巴之天主教,计其源流支派、情形地势,考证而辨明之,绘为图说,并杂论古今人物学术文章,政治之利弊得失……。”以上,可以说是概括了《康轶纪行》的基本内容。

《康輶纪行》较之当时其它介绍边疆史地和世界地理的著作，其突出成就有三：

第一、介绍了为当时的人们不太熟悉的康藏地理，对康藏地理的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兹举其要端，略述于后：

(一)详细记述了沿途所经之山川道里、村名塘站、民情风俗和物产气候。当时，有关康藏史地的著作主要有王我师的《藏鑑总记》、秦庵的《西藏赋》、盛绳组的《卫藏图识》、齐召南的《水道提纲》以及《大清一统志》等有关部分。《藏鑑总记》和《卫藏图识》对四川、青海等省进藏山川道里、塘站记载颇详，但对沿途风俗民情较少涉及。《西藏赋》既涉及到山川形势，又记述了风俗民情，但详西藏而略西康。至于《四川通志》和《水道提纲》，大都撷拾《大清一统志》等诸旧籍，实无身经目击之证。姚莹两次康藏之行，往复万余里，其所记沿途所经之山川道里，村名站头，民情风俗，物产气候，皆为自己耳闻目睹，自较其它著述较为准确。其记述所经山川道里之详细程度，更为诸书所不及。例如，他记述作为川藏分界之宁静山时，写道：

西行十余里过邦木，设蛮塘汛于此。……过此则山形耸峻矣。数里跻其颠，复宽衍。峰峦秀复。即所谓宁静山也。运运久之，见雍正五年所立界碑。山以东为川辖；山以西为藏辖，碑裁二尺，字已漫灭。已若有巡兵数名于此。山大而长，东向一山如屏，南北各起一峰翼之，势如龙虎朝拱内地。自打箭炉至此，未有若此山者。宜以宁静得名也。

显然，非亲历其地者不能记此，如以上记述者，在《康輶纪行》中尚多。

(二)以自己亲自考察访问之所得，证前人之记载。如：关于由四川、青海和云南进藏道里问题。姚莹引《藏鑑总记》和《卫藏图识》，结合自己所经之实际情形，详述由

四川之打箭炉(康定)和青海之西宁、云南之塔城关等路进藏的塘汛站名和道里远近，认为二书所记尤其是《卫藏图识》与实际情形大致吻合；指出《藏鑑总记》“于后藏以外茫然不能详。盖其作于雍正年间，疆理尚未定也”，“及乾隆中，藏地大定，《卫藏图识》乃出。其道路程站皆据乾隆五十三年军需档案。因宜其详而有征也。”此外，姚莹对明僧宗泐所记黄河和金沙江源，以及《今舆图》所记大渡河、雅砻江等河流向，均以亲历所闻论证之。

(三)纠正他人著述中以讹传讹之记载。如关于察雅诸河的源头和流向，《四川通志》云：“勒格河在察雅大寺前，源出察雅西北昂喇山下，合甲仑格河，又有乐格河，源出察雅西北作喇山，合甲仑格河。甲仑格河经流洛隆宗，合乐格河到察雅界。又有色格河，源出上纳夺，经流江卡西南入察木多大河”。这里，《四川通志》把察雅地区的河流说得纷纭复杂，茫无头绪。姚莹指出其中有两大错误。第一，勒格河即《今舆图》之勒楚河(按：应即察雅河，又名麦曲)，源出察雅东南，在江卡之东北(按：在贡觉南境之波多拉则卡)，与察雅西北之昂喇山无涉。《四川通志》以为源出昂喇山，“失之远矣”。第二，色格河者，应为《今舆图》所记之匝楚河(按：今名扎曲)。其东北有一小水(按：今名格曲)发源上纳夺，西南流来会。匝楚河即察木多大河(按：应为其东源)，南流经察雅之西境会楚楚河、色尔恭河、勒楚河，南过江卡入澜沧江。而察木多在江卡之北上流数百里。《通志》所谓“色格河源出上纳夺，经流江卡等处西南流入察木多大河”者，显然把主流和支流、上游和下游都颠倒了。此外，姚莹还在书中纠正了《四川通志》关于澜沧江东西源，以及和秦庵把后藏作天竺的错误。

(四)对他人著述的补充。例如：记左贡

入藏道里，补《藏鑑总记》和《卫藏图识》所不及。姚莹在旅途中，获悉入藏之道，自察雅地区之石板沟分道，由左贡行十一站至瓦合寨与进藏大道合，则比由石板沟经察雅、察木多至瓦合寨少三站路程，且路甚平坦，亦不过溜筒之险。他又访诸“常行此路者，乃得其详”，从而详细记述了自石板沟分道自瓦合寨的道里远近和村名站头、马夫供役等。姚莹又指出，由左贡至江卡复有一路。左贡以上与左贡入藏道里同，左贡以下乃分道，不经石板沟，六站而至江卡。姚莹所记左贡入藏道里和左贡至江卡一路，不仅康藏之民“常行此路”，而且是“达赖喇嘛每年由藏灵茶大道”，甚至“近十余岁运饷委员由藏返省皆取此道”，却为诸书所不载，姚莹详记于《康轶纪行》，弥补了他人著述之不足。又如：《四川通志》和《卫藏图识》等书，对察雅地区的山川形势、道里远近有所记述，但只及大道两旁，未详整个察雅地区。姚莹则比较详细地考察了察雅地区的疆域范围和山川道里，绘制了《察雅地形图》，并撰图说。人们利用地图和图说，对察雅地区的疆域范围，两呼图克图所辖地，以及诸路进藏道里，均可一目了然。

第二、介绍了与我国西藏相邻诸国的地势情形，进而揭露了英国侵略西藏的野心。姚莹通过对英属孟加拉、东印度、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以及相互关系的研究，不仅了解到英、俄两国因争夺中亚和南亚产生的矛盾，而且觉察到英国在侵占印度和孟加拉后，又企图控制廓尔喀和哲孟雄，并进而侵略西藏的野心。他指出：早在禁烟运动前，“英吉利先已鸱张，欲谋并廓尔喀以窥西藏矣”，并具体揭露说：“先是，哲孟雄与披楞（英属东印度一部）隔界，有大山甚险阻无路，有一线道可容羊行。近为英人所据，屯兵其上，凿宽山道，可以长驱抵藏矣。”

以后，他在给林则徐、余小坡等人的信中，又多次揭露英国“窥藏之心久矣”的情形，并满怀忧虑地指出英国“为患于藏者，不亦迫乎？”<sup>⑤</sup>英国侵略西藏的历史证明了姚莹的预见性。毋庸置疑，姚莹是近代初期最早觉察和揭露英国“窥藏之心”的爱国者之一。

第三，表明了学习西方长技的思想和立场。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姚莹在对外国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已经产生了学习西方长技的倾向。他获悉“夷船灵捷，惟在布篷”，即提出我水师战船“易箴为布，节节为之，则转驶亦灵”的设想。<sup>⑥</sup>战后，他对西方国家的长处有了进一步认识，因而在《康轶纪行》中不无感慨地说：“白夷泛海，习天文算法者甚众”，而中国“天文算数几成绝学，对彼夷人，能无泚然愧乎？”他赞扬欧罗巴人“方孜孜勤求世务”，痛心“中华反茫昧自安”。为此，他抨击那种“株守一隅，自划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袭，曾不知所忧虑”的守旧思想是“误天下国家”的“拘迂之见”。他又详考了自利玛窦到中国以后，西方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一方面指出天主教的“支离荒诞”，另一方面推崇“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因此，他希望清政府能象康熙、雍正年间那样，对西方国家“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这样，姚莹就明确地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宗教侵略区分开来了。他反对宗教侵略，但主张学习西方有用的科学技术。这明显地反映了近代学习西方思潮之第一批开拓者的认识。

《康轶纪行》除上述三方面成就外，其对世界地理的研究和介绍也值得重视。姚莹在《康轶纪行》中，绘制、搜集、校补和自订了《西藏外各国地形图》、《新疆西边外属国图》，以及七幅世界地图，并一一撰写

图说。在七幅世界地图中,《今订中外四海輿地总图》是姚莹在其它六图的基础上,再根据魏源《海国图志》,“以今时地名参考互订”而成。他又参考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南怀仁《坤輿全图》等,对魏源《海国古今沿革图》略为考订,作《海国古今异名》,使亚、非、欧数十国的“古今异名可以一目了然”。此外,他还在《华人著外夷地理书》和《中外四海地图说》中,列举了我国自法显《佛国记》以后的世界地理著作,评述了自汉代以来中国人研究世界地理的历史概况,高度评价了林则徐和魏源的成就。

《康輶纪行》的最大特点是其内容大多根据姚莹自己“亲历、考证、所闻”,全书贯穿着姚莹反对侵略的爱国思想,充满着忧国忧民的感情。《康輶纪行》对当时的人们不仅起到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的作用,而且是唤醒他们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为反对西方侵略而去了解世界的启蒙著作。它极大的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忱。时人评论姚莹之著《康輶纪行》是“俾天下晓然,不为蛮夷所欺”,赞扬他的“忧国忧世之心,岂不深远也哉。”<sup>①</sup>因此,尽管《康輶纪行》研究和介绍世界地理的成就不及《四洲志》、《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但仍不失为近代初期第一批提倡开眼看世界的著作之一。其体现的了解世界和学习西方长技的新思想,则和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一样闪烁着光辉,并在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有着重大影响。

### (三)

姚莹之写《康輶纪行》,有着明显的反侵略目的。他试图通过向同胞介绍边疆地理和敌情外事,并略加论评,以唤起国人放眼世界和重视敌情研究,进而筹画出御敌雪耻

的反侵略方略。姚莹的这一反侵略思想,是在反对西方侵略的斗争实践中逐渐产生、发展和形成的。

鸦片战争以前,姚莹是当时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的代表之一。他与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包世臣等侧重致力于社会经济改革的“经世派”相比,其特点是注重研究边疆地理和了解敌情外事。而且,这种研究和了解带有明确的反对西方侵略的目的。1808年(嘉庆十三年),姚莹二十四岁时考中进士。次年,他被两广总督百龄邀入幕府。而就在1808年,广东发生了英国军队登陆并强占澳门达三月之久,以及英国兵船强行闯入虎门,停泊黄埔几近两月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事件。姚莹到粤后,新任两广总督百龄尚在办理善后事宜。他作为总督幕僚,当然知道事件的始末和性质的严重性。1810年1月,姚莹到粤还不到半年,广州又发生了英国船员肇事杀死中国人黄亚胜的事件。虽经总督等地方大吏交涉,英方仍拒绝交出凶手,以至案件拖了一年多也没有结果。英国侵略者这种目无中国主权和法制的侵略行径,对姚莹的刺激是很深的。因此,他在广东作幕和后来在福建、台湾任地方官吏期间,一方面不断揭露英国的侵略野心,强调加强边海之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开始了解外国,研究边疆和世界地理。其代表作是《识小录》和《东槎纪略》。

《识小录》是姚莹在广东时期研读中外史地著作的札记。书中概述了蒙古、新疆、西藏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分布和宗教信仰,记述了中俄边界的地理沿革、勘定和走向,以及中方边防哨卡的设置和驻军情形等。姚莹还指出:中俄贸易对俄方十分有利,而俄军却经常袭击中国边防哨卡和巡逻士兵,抢劫中国商人,破坏边界的稳定。他由研究边疆地理,进而考察了相邻诸国的情形。如他在《廓尔喀》一文中,记述了廓尔

喀(尼泊尔)的历史、地理、民族风俗、中尼关系,以及西藏至廓尔喀的道里远近和所需日程等,表明了对西南边疆及其相邻国家情况的重视。此外,姚莹还摘录了一些关于英国、法国、普鲁士等欧洲国家的材料。在这本书中虽然反映了姚莹当时对边疆地理和外国情事的了解还比较肤浅,其研究也多据松筠《绥服纪略图诗》和七椿园的《西域闻见录》,但是,它是姚莹直接受到英国侵略罪行刺激的第一部发愤之作。其著书意旨是为着反对西方侵略。正如姚莹自己所述:“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著论于《识小录》矣。”正是这种为了反对西方侵略而去了解世界的思想,推动着姚莹始终不渝和孜孜不倦地研究边疆史地和世界地理。

《东槎纪略》是姚莹任台湾噶玛兰通判时所著。他在任期间,“访诸耆老,……考诸案牍,咨询旧吏”,搜集了有关噶玛兰的历史、地理,以及汉族和当地少数民族共同开发噶玛兰的资料,结合自己对台湾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的考察情况,编撰成书。《东槎纪略》在研究边疆史地方面的成就超过《识小录》。它是研究台湾史地的早期著作之一,至今仍仍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还应指出的是:姚莹在书中追述了台湾同大陆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强调台湾在保卫祖国东南边疆方面的屏障作用,希望《东槎纪略》能作为“后之君子”治理和保卫台湾时制定方略的依据。因此,《东槎纪略》和《识小录》一样,反映了姚莹为防御西方侵略而研究边疆史地和了解世界的思想。

上述姚莹因“外夷桀骜,窃深忧愤”而“考其大略”的思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反侵略实践中得到迅速发展。由于反侵略斗争的需要,当林则徐在广州大量购求和翻译外国书报之时,姚莹也在台湾通过“问诸老商”,审讯英俘等途径了解敌情外事。他审

讯英俘时,从英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到对外关系;从其铸炮造船到与中国作战的长处和短处等无不询及。在世界地理方面,姚莹这时除继续研究战前在福建龙溪令任上得到的陈伦炯《四海总图》外,还认真研究了为时人不大注意的艾儒略《万国全图》和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他又利用英俘颠林绘制了一幅《英夷及各国地图》,并考证诸书,为之撰写图说。他认为陈图是“中国民间有图之始”,但“不及南怀仁之详备”,且“无五洲之说”;颠林之图“得其海陆形势颇具”,“惜其仅知西南海陆事,自俄罗斯斯东北未能悉也”;南图则较为详备,“国名、岛名、山川人物皆注之”。因此,他“取其国土山川之大者,编为小图”。经姚莹缩小的南怀仁之图,当时即被台人并陈伦炯、颠林二图(附姚莹撰写的图说)刊刻印行。姚莹又根据南、陈、颠三图,自订了一幅《中外四海总图》,并欲自成一书。他通过上述调查研究,了解到许多重要的敌情外事。诸如英国侵略军的长处和短处及其与法、美等国的矛盾等等,从而颇得其形势虚实,并得以据此在台湾制定比较符合实际的抗英方略,满怀信心地坚持反侵略斗争。此外,姚莹在调查研究中,还把自己在战前开始的对边疆和世界地理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为战后《康輶纪行》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战争的失败和蒙受冤狱,给姚莹极大的刺激,使他悲愤填膺。自被“革职鞫问”到“槛车入都”的几个月间,他满怀悲愤的心情在给挚友的信中倾诉了自己蒙受的冤屈,一再表示对战争失败的愤恨。他说:“独念以天朝全盛之力,偏于数万里外之丑夷,失人心伤国体竟至不可收拾,是不能无恨耳。”<sup>①</sup>他揭露投降派不了解敌情外事,对侵略者不知底蕴,以至丧权辱国,不知愤耻。他进而诉述自己虽蒙受冤狱却难忘国家民族之大辱的心情说:“夫君子之心,当为国家宣力

分忧，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荣辱也”，“然此心为不能忽然无恨者，则天下之忧。此即翁不忧一身，而悲愤时事之意云尔”。<sup>⑤</sup>因此，他表示宁可“追随林、邓二公相聚西域”，也不为投降派的诬陷所屈服。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反侵略爱国思想，激励着他百折不挠地寻求御敌雪耻的真理。

姚莹出狱以后，读到了魏源送给他的《海国图志》。因读《海国图志》，他又得以知道林则徐所译之《四洲志》以及《华事夷言》和《澳门月报》等，了解到许多前所未闻的敌情外事，这使他十分激动和兴奋，情不自禁地说：“大获我心！”《海国图志》还使他进一步认为战争失败的关键是不了解敌情，痛感开眼看世界的重要性，从而对“海外事势夷情”更加勤求访问。这正是他对“察雅之役，欣然奉使”的基本原因。

姚莹两次康藏之行以及后来撰写《康轶纪行》的过程中，其反侵略爱国思想愈趋成熟。《康轶纪行》初稿甫成，他即在复光律原的信中毫无隐讳地阐述了自己的著书目的。首先，他举出“天主教邪明禁已久，一旦为所扶而复开，其他可骇可耻之事，书契以来所未有也”的事实，指出在战后短短几年中，中国的大门不仅向英国洞开，而且已成为西方列强砧俎上的鱼肉，痛切地感到：“海外诸夷侵袭中国甚矣。”由此，他进而提出了“既震其积威，复申之邪教，几何其不胥中国而沦于鬼魅乎”的忧虑。接着，他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认为“自古兵法，先审敌情，未有知己知彼而不胜，贖贖从事而不败者也”；“夫海夷之技未有大胜于中国也，其情形地势且犯兵家之大忌。然而所至望风披靡者，何也？正由于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船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僨败至此耳”。<sup>⑥</sup>为此，他陈述自己之著书目的说：“澳门夷人至于著书笑中国无人留

心海外，宜其轻中国而敢肆猖獗也。莹实痛心！故自嘉庆年间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近岁始得其全。于海外诸洋有名大国与夫天主教、回教、佛教一一考其事实，作为图说，著之于书，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闻，知彼虚实，然后徐图制夷之策。是诚喋血愤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sup>⑦</sup>反对闭关自守，强调了解外国，把研究和介绍敌情外事与反对西方侵略乃至“免胥沦于鬼域”——避免亡国灭种联系起来，这即是姚莹著《康轶纪行》的目的。

由《识小录》到《康轶纪行》，反映了西方列强不断加紧侵略中国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姚莹反侵略爱国思想和开眼看世界思想逐渐成熟的过程。正因此，姚莹著《康轶纪行》时，任何压力都改变不了他的著书动机。他在四川期间，先是受到宝兴，接着又受到继宝兴任四川总督的琦善的歧视，以至友人中有劝其引退以避难者。他以义自励，婉言却之，当有人指责他“一腔热血何必掬以示人”时，他激愤地回答道：“余谓君血未必真热血耳”。“所谓热血者，视天下国家之事如己事，视人之休戚痛痒如己之休戚痛痒，展转于怀不能自己，夫是之谓热血，岂可轻易言之耶？”也正是这种“视天下国家之事如己事”的一腔爱国热血，推动着姚莹在魏源因著《海国图志》而“已犯诸公之忌”时，毅然以“荻咎之人”勇敢地写出了《康轶纪行》。

#### 注释：

①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鸦片战争》（六）第164页。

②即活佛。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姚莹《东溟文后集》。

⑪姚莹《康轶纪行》。以下凡引此书者不再一一注出。

⑫方复恒《康轶行跋纪》。